

#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工作、 家庭关系及其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

张春泥<sup>1</sup> 周洁<sup>2</sup>

(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负面情绪; 工作; 家庭关系; 性别差异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两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害怕、焦虑、担忧这些典型负面情绪的变化, 以及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影响的性别差异。借助2020年1月至3月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的网络追踪调查, 本文发现, 虽然在疫情初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 但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 女性负面情绪已降至与男性同一水平。疫情给女性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男性大, 这不利于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 较之男性, 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工作出现消极变化的女性, 家庭关系的改善能够缓和工作损失对她们情绪的不利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21)02-0040-13

## Work,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Gender-Based Influences on Negative Emot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ZHANG Chun-ni<sup>1</sup> ZHOU Jie<sup>2</sup>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 Words:** the COVID-19 pandemic; negative emotions; work; family relationships; gender-based differences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hanges in gender-based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and men's exposures to negative emotions including fear, stress and anxiety, during the COVID-19. It also examines whether these changes were related to changes in work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that had affected men and women's negative emotions differently. We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across China in January 2020 during the initial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then followed up with the same respondents at the end of March 2020.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espite women revealed a higher level of negative emotions than men did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andemic, the negative emotions were overall alleviated for both sexes and the gender gap disappeared as the domestic pandemic was brought under control. Compared with men, women suffered greater losses in work during the pandemic, which resulted in a rise of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However,

作者简介: 1. 张春泥(1985-),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社会人口学、社会分层。2. 周洁(1982-), 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 社会态度、群际关系。感谢助理赵佩昕为本研究所所做的工作。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活动“疫情背景下的妇女与发展: 挑战与应对”学术研讨会(批准号: 20STB075) 发言论文, 以及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攻关专项课题(人文社科类)”项目“公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认识、行为与态度调查”(项目编号: 36) 的成果。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would have been beneficial for women's emotional wellbeing more than for men's. Moreover, for women who experienced job losses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s could help them address the negative emotions caused by the losses.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2020年初全面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成为2020年乃至未来几年全球关注的重大事件之一。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对经济、就业、民生等诸多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或持续性影响。面对这一高传染性、有一定致死率且可能对身体机能带来长期损伤的流行病,以及疫情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危害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negative emotion)。其中,担忧、害怕、焦虑是人类在面对灾难时最为典型的负面情绪<sup>[1]PP16-19</sup>,这些负面情绪的出现会进一步威胁人们的健康,引发诸多不良身心后果,如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攻击性行为增加等<sup>[2]PP15-30 [3]PP602-616 [4]PP649-666 [5]PP533-549</sup>,不利于人们正确应对疫情、保持健康。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期较长,负面情绪还有可能演变为负面心境(mood)成为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不利于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调整和恢复。已有研究关注了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之初在人群中引发的负面情绪,发现担忧、害怕、焦虑的程度非常高<sup>[6]PP1-2 [7]PP68-76 [8]PP103-111 [9]PP1254-1260</sup>。不过,社会对疫情演变下负面情绪的变化仍关注不足,尤其是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负面情绪如何变化,是能及时得到缓解,还是会持续发展为负面心境?这些心理情绪的变化与人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对评估疫情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和从社会生活角度提出防范或降低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冲击具有参考价值。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还持续处在疫情进行时的状态不同,中国从2020年3月以来疫情就已基本得到控制,大部分地区经济重启,生活几乎回归正常,这为探讨疫情演变下负面情绪的变化及其社会因素提供了研究场景。

在探讨疫情的社会影响或后果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受疫情影响的差异性或不平等。在疫情初期,曾有观点认为,致命性的疫情会成为撬动不平等的杠杆<sup>[10] [11]</sup>。这一时期由于新冠病毒

快速、无差别的传播性及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男人还是女人,身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难以幸免,即“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随后的研究很快否定了这一论调,大量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了既有的不平等,弱势群体、脆弱人群的死亡率更高,受到失业、收入损失、经济困难等负面影响更大<sup>[10]PP1-5 [12]PP1-10 [13]PP22277-22288 [14]PP1-6</sup>,其中也包括性别不平等的扩大<sup>[15]PP846-848</sup>。已有多个国家的研究显示,虽然女性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低于男性<sup>[16]PP59-62</sup>,但女性的就业和家庭生活在疫情中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和就业上,除少数国家外<sup>[12]PP1-10</sup>,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面临失业、生意倒闭、工作产出下降和收入减少<sup>[17]PP1-29 [18] [19]PP1-3 [20]PP1-5</sup>;由于居家隔离,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料家庭成员的责任<sup>[17]PP1-29 [21]PP1-12 [22]PP1-14</sup>;居家隔离也增加了女性遭受家暴的风险<sup>[23]</sup>。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已有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女性比男性更易感受到焦虑和紧张等负面情绪<sup>[24]PP172-176 [25] [26]PP1-5 [27]PP1-28 [28]P1729</sup>。

不过,上述大多数研究均以疫情初期或上升期为背景,而随着疫情趋于好转,较之男性,女性面对疫情时的负面情绪会如何变化?国内疫情虽然已基本得到控制,但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负面影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受到疫情更大不利影响的女性会如何评价疫情对工作和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与她们心理情绪的变化有何关系?在疫情心理的影响因素上女性是否有别于男性?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心理情绪的性别差异,也有助于理解疫情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结合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女性在疫情中负面情绪的变化是否与男性存在差异?鉴于传统上男性和女性在工作 and 家庭领域分工的侧重点不同,本研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疫情期间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对女性负面情绪发展变化的影响是否有别于男性?

对此,我们借助在国内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对同一批受访者采集的网络调查数据,探讨人们面对疫情时的害怕、焦虑、担忧这些典型负面情绪变化中的性别差异,以及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男性和女性负面情绪发展的不同影响。

## 二、文献回顾

在危机状态下,负面情绪并非唯一的情绪状态,却是最常见的心理反应。例如,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会激发公众团结一致、积极抗疫的正面情绪,不过由重大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高传染性、严重的伤害性,往往会带来更普遍和更高水平的负面情绪<sup>[1]</sup>。在负面情绪的应对和反应上,男性和女性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女性在危机状态下体验到的负面情绪更多,其焦虑和愤怒情绪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sup>[29][PP197-201]</sup>。同时,女性对各种情绪刺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强烈<sup>[30][PP2036-2038]</sup>;女性在面对情绪刺激时会比男性表现出更大的面部肌肉运动和更强的身体肌电反应<sup>[31][PP1010-1022]</sup>。究其原因,一方面,男性和女性对风险的感知不同,女性比男性在涉及安全和风险的问题上更为敏感<sup>[32][PP111-117]</sup>;另一方面,当出现情绪问题时,男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更好<sup>[33][PP56-57]</sup>,也更加相信自己能够有效调节自身情绪<sup>[34][PP44-47]</sup>。

不过,人们对待疫情的负面情绪并非仅仅来自对病毒的恐惧或对健康的关注,还来自认识到疫情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在微观上体现为感受到疫情对个人工作和家庭的冲击。随着疫情的持续和蔓延,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受到疫情冲击,身处劳动力市场中的人要时刻权衡躲避病毒和维持生计之间的冲突,以及要应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因而承受了更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中,影响西班牙人担忧情绪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健康相关的变量,而是人们对疫情之后经济衰退的忧虑<sup>[27][PP1-23]</sup>。家庭关系对疫情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调节作用。家庭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不仅能够帮助个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也提供了重要的情感能量。一些研究初步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处于婚姻

和同居状态的人在心理和精神上的痛苦相对较小<sup>[27][PP1-23]</sup>,而孤独感则与疫情期间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有极强的相关性<sup>[24][PP172-176]</sup>。

疫情期间工作和家庭的变化对女性心理情绪的作用是否与男性存在差异?这一问题在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既有研究中探讨尚不充分。一方面,工作和家庭之于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不同。受传统性别规范和分工实践的影响,一般认为工作或事业是男性的主要领域,家庭则是女性的主要领域。以往研究表明,两性在情绪反应上的差异会受到更深层的社会角色分工等文化因素<sup>[35][PP40-43]</sup>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sup>[36][PP812-819]</sup>。据此假设,工作得失对男性心理的影响应该比女性大,家庭得失的变化对女性的心理影响应该比男性大。比如,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失去工作的男性比女性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sup>[37]</sup>。在非洲埃博拉疫情期间,女性迫于性别规范要承担对患病家庭成员的照料,不仅被迫暴露在更高的感染风险下,还会因家庭成员在疫情中去世或自身感染而被指责“看护不力”,故而承受了更大的心理负担<sup>[38][PP25-33]</sup>。

另一方面,不能简单认为工作上的损失对女性的心理情绪不重要,或者认为家庭投入不影响男性的心理情绪。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工作对如今的女性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也影响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尤其在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性别规范也认可女性的就业和劳动参与。前面已经提到,此次疫情对女性工作冲击较大,在中国也是如此。由于职业性别隔离,女性与男性集中就业的行业不同,所受疫情的冲击程度不同。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卫生、社会工作和教育行业外,女性占比较高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均受到较大冲击,在202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用工需求比上一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相比之下,男性占比较高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则有一定的增加<sup>①</sup>。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多从事非全职工作,就业不稳定。由于两性工作特征的差异,我们有理由探讨女性在就业和工作上遭遇的更大冲击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查询的数据整理。

是否进一步影响她们在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工作和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源自居家办公。与以往发生重大危机或其他疫情时的情况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泛使用的互联网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线上教育等手段让大规模人群实现了居家办公、停课不停学。但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居家隔离和社区封闭管理意味着更多男性留在了家中,让其有时间承担一定的家务。有观点认为远程办公提供了兼顾家庭和工作事务的弹性方案,提高了男性对家务劳动和育儿的参与,产生了新的平等分工模式,并预测疫情之后这种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平等性可能会被保留<sup>[2]</sup>。但是,另一些研究者的观察发现,远程居家办公彻底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工作和家庭事务相互干扰,导致女性更难平衡家庭和工作,更容易筋疲力尽和感到焦虑,而男性则可以相对置身事外<sup>[9] P11-14</sup>。鉴于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疫情期间两性家庭关系的变化,以及家庭与工作对男性和女性疫情负面情绪的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虽然指出了两性在负面情绪上的差异,以及疫情对两性工作和家庭的影响,但对于工作、家庭对疫情负面情绪发展性别差异的探讨仍然不足,也缺乏更多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我们的研究将借助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和女性如何评价疫情对其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并检验工作、家庭关系的变化对女性负面情绪变化的影响是否与男性有所不同,以期更好地理解疫情对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 三、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在线调查,该调查受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攻关专项课题(人文社科类)”资助,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教育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学者共同设计<sup>②</sup>,并联合澎湃新闻和线上调研平台“调研家”实施。该调查采用线上自填问卷方式,通过澎湃新闻线上推广和社交媒

体转发,先后进行了两轮截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随后针对在前两轮截面调查中留下手机号的受访者开展了一轮追踪调查(panel survey)。第一轮截面调查自2020年1月26日10时发起,截至1月27日结束,共有来自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928名受访者参与了问卷填答,其中常住地或调查时所在地为湖北省的受访者有1138人。第二轮截面调查从1月28日持续至2月15日,新增参与者4126人。3月13-30日,针对前两次截面调查留下手机号码的参与者(占45%),项目组通过短信发送问卷链接,对他们进行线上追踪访问,了解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变化。该调查共成功采集3493名受访者的追访数据,追踪成功率为35.2%。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见图1),2020年1月20-26日是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初期,确诊人数以相对较小的幅度增长;1月27日左右新增确诊数进入爬坡期,在2月12日改变确诊标准以前,全国除湖北省以外的新增确诊人数约在2月5日达到峰值,随后缓慢下降,但湖北省内的情况依然严峻,新增确诊人数到2月中旬仍然处于高位。3月下旬,包括湖北在内的全国所有地区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各地陆续实现本地病例零增长,新增疫情主要来自海外的“倒灌”。对应于三轮调查数据,前两轮截面调查的时间正值疫情上升期,反映的是疫情严峻时受访者的心理和态度;追访调查则恰好反映的是疫情下降期人们的状态。本研究将前两轮截面调查数据合并作为基线数据,并将之与追踪数据相匹配,共得到3378名<sup>③</sup>先后接受基线和追踪两次调查的受访者作为分析样本,以此来比较同一批受访者在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负面情绪的变化。

依靠媒体推广和网络滚雪球的调查得到的是非概率样本数据,由于互联网用户的特征和传播特性,网络调查通常对中老年人、低学历群体覆盖不足,本研究的样本亦存在这一代表性的问题。鉴于此,在

②除了论文作者以外,调研组主要成员还有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副教授和经纬、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骆为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汪洋等。

③已排除有变量缺失值的样本。

进行统计分析时,我们利用 2015 年 1% 人口抽样数据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布对样本数据进行

了加权,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网络样本代表性的不足<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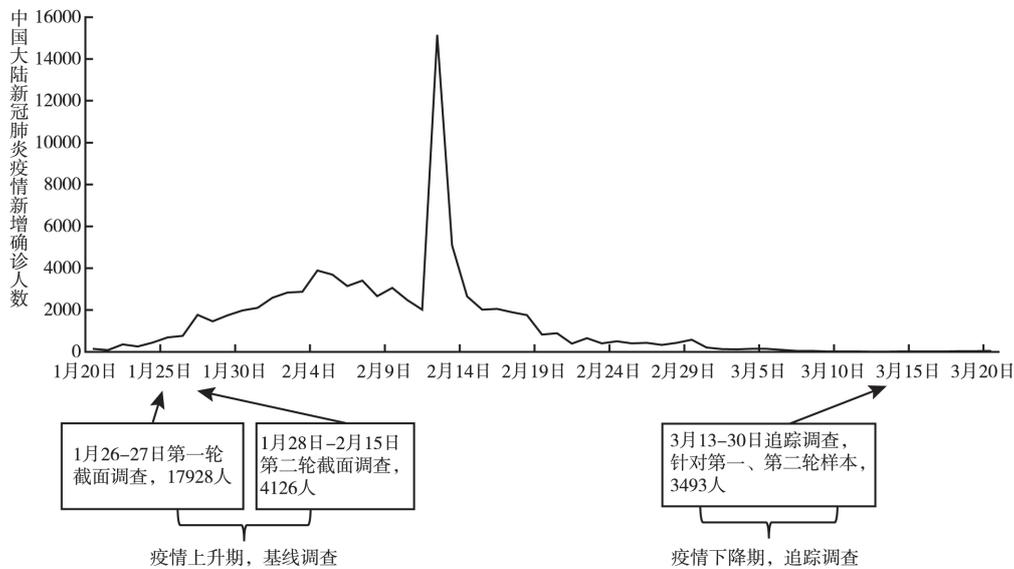


图 1 2020 年中国大陆新冠肺炎疫情新增确诊人数和调查时点

本研究关注的负面情绪是指焦虑、害怕和担忧这三种人们在面对风险时最常见的心理情绪。问卷中提问了受访者想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他们目前(即调查时)感受到的焦虑、害怕和担忧程度。选项均为五级,焦虑程度为“非常焦虑”“比较焦虑”“一般”“不太焦虑”和“一点都不焦虑”;害怕程度为“非常害怕”“比较害怕”“一般”“不太害怕”和“一点都不害怕”;担忧程度为“非常担忧”“比较担忧”“一般”“不太担忧”和“一点都不担忧”。我们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对负面情绪的强度进行赋分,最低分 1 分表示一点也不焦虑/害怕/担忧,最高分 5 分表示非常焦虑/害怕/担忧。根据信度分析,基线调查和追踪调查在这组负面情绪题评分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86 和 0.85,测量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因此这三种情绪得分可直接相加后取算术平均值,以此构造负面情绪得分  $Y_{baseline}$  和  $Y_{followup}$ 。由于这一组题在基线调查和追踪调查中的测量方案完全相

同,我们将同一受访者在追踪调查的负面情绪得分与基线调查的负面情绪得分相减,得到情绪得分的分值差  $\Delta Y = Y_{followup} - Y_{baseline}$ ,表示受访者负面情绪的变化,作为研究的因变量。由于大多数受访者的负面情绪得分是在疫情上升期较高,疫情下降期较低(即  $Y_{baseline} > Y_{followup}$ ),因此,分值差的负值越大,表示负面情绪缓解越多。

本研究关注的是两性的工作、家庭关系因疫情的变化对其负面情绪变化的影响,因此疫情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疫情对工作的影响是研究的关键自变量。在追踪调查中,我们请受访者自己评价疫情对他们与伴侣、父母、子女的关系及对工作等方面的影响,分为“负面影响为主”“积极影响为主”“没有影响”;对不在婚或无伴侣者、父母去世者、未生育子女者、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可以在与其无关的题目中回答“不适用”。我们将家庭关系操作化为受访者与伴侣、父母、子女的关系,利用问卷信息,将受到负面

<sup>④</sup>在未加权的调查样本中,30.1%为男性,69.9%为女性;91.3%为45岁以下的青年人,其中25岁以下者占51.1%,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占6.5%;92.5%有大专或以上学历。在加权后的样本中,50.3%为男性,49.7%为女性;45岁以下者占62.1%,其中25岁以下者占20.7%,45岁及以上者占30.9%;大专以上学历者占20.8%。加权后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更贴近总人口的分布情况。

影响为主赋值为 -1,没有影响赋值为 0,积极影响为主赋值为 1,并计算这三者的算术平均分,以此测量疫情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该变量取值从 -1 到 1,表示疫情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从负面影响为主到正面为主的变化。除家庭关系的平均分外,我们还直接使用受访者与伴侣关系、父母关系、子女关系的得分来研究不同维度家庭关系在疫情中的变化对负面情绪的不同影响。我们根据受访者的评价和其就业状态将疫情对工作的影响区分为五类:积极变化为主、消极变化为主、不受影响、在读状态、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不包括在读)继而将之处理成一组虚拟变量(1 = 是,0 = 否),以工作不受疫情影响的在业者作为参照类。

此外,在分析时我们还将纳入受访者个人的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年龄段划分为三组:24岁及以下(参照类)、25-44岁、45岁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按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处理为两类:高中及以下学历(参照类)、大专及以上学历。考虑到全国各地受到疫情影响的程度不同,且追访调查持续了半个月有余,各地疫情也处在持续变化中,我们将受访者在接受追访调查当日其常住地所在省份的新增确诊人数作为宏观环境的控制变量。此外,由于我们的因变量是负面情绪的变化量,其变化的幅度也取决于其初始水平,因此,我们将基线调查的负面情绪水平也作为控制变量。表1描述了上述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表1 研究自变量的统计描述

	女性(N = 2366)		男性(N = 101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工作不受影响(参照组)	0.31	0.46	0.29	0.45
工作以积极变化为主	0.04	0.20	0.10	0.30
工作以消极变化为主	0.32	0.47	0.27	0.44
退出劳动力市场	0.14	0.34	0.12	0.33
在读	0.19	0.39	0.22	0.41
家庭关系平均分	0.08	0.53	0.17	0.50
与伴侣关系得分	-0.07	0.53	0.09	0.49
与子女关系得分	0.08	0.44	0.09	0.40
与父母关系得分	0.12	0.55	0.16	0.56
24岁及以下(参照组)	0.20	0.40	0.22	0.42
25-44岁	0.41	0.49	0.49	0.50
45岁及以上	0.39	0.49	0.29	0.45
高中及以下学历(参照组)	0.77	0.42	0.78	0.42
大专及以上学历	0.23	0.42	0.22	0.42
所在省份新增确诊数	3.23	3.77	3.97	4.57

注:数据已加权。

在数据分析上,首先,我们简要描述在疫情上升期和下降期两性面对疫情的负面情绪水平,以及疫情对两性家庭关系、工作分别带来的影响。

其次,我们分男女样本采用因变量方差削减的方法来比较个人特征、工作状态、家庭关系这三个不同自变量(组)对因变量(负面情绪变化)的相对解释力。该方法曾用于比较不同因素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在不同情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性<sup>[40]PP173-192 [41]PP6928-6933</sup>,在我们的研究中则用来比较不同因素对男性和女性负面情

绪变化的相对影响。具体做法分为以下三步。第一步,分别计算个人特征、工作状态、家庭关系对因变量的解释力比例,通过建立只有一个或一组测量同一内容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模型,求出每个(或每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双变量判定系数(Bivariate  $R^2$ )。通常,双变量判定系数会与其他未在模型中被控制的变量的解释力相混淆。第二步,构建一个同时纳入基线得分、个人特征、工作状态、家庭关系因素的完全模型,在这个完全模型中依次轮替删除其

中一个(类)因素  $K$  ( $K$  可以是工作特征,也可以是家庭关系,或是个人特征),以此计算当其他因素均被控制的情况下,因变量剩余方差中被  $K$  变量(组)所解释的比例,即偏判定系数  $\text{Partial } R^2$ :

$$\text{Partial } R^2 = \frac{R^2 - R_{-K}^2}{1 - R_{-K}^2}$$

在以上公式中,  $R^2$  是完全模型的判定系数,  $R_{-K}^2$  是指排除  $K$  变量(组)之后模型的判定系数,表示排除某个因素后的剩余方差比例。第三步,分别将个人特征、工作状态和家庭关系的双变量判定系数和偏判定系数相比较,何者的双变量判定系数和偏判定系数差异较大,说明其对负面情绪变化的相对影响较高。

最后,对男性和女性分别建立 OLS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主效应模型中,关注工作和家庭关系在疫情中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变化的效应;在主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关系变化与工作状态的交互项,通过交互项的效应来探讨工作状态对两性负面情绪变化的影响如何通过家庭关系来调节。

#### 四、研究发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多数人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焦虑、害怕和担忧。图 2 显示,在疫情上升期的基线调查中,女性比男性的负面情绪更高,但随着 2020 年 3 月以来国内疫情好转,由疫情引发的负面情绪也趋于缓解,其中女性负面情绪的改善更为突出;追访数据显示,女性的负面情绪得分已降至与男性相同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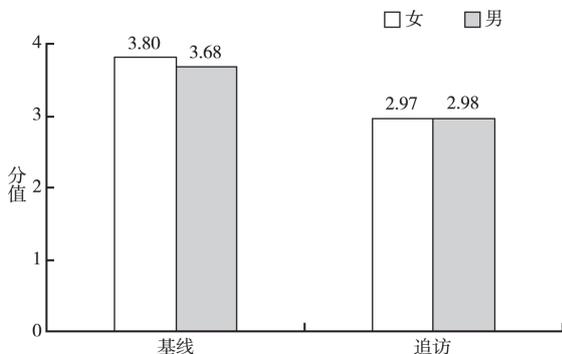


图 2 基线和追访调查中两性负面情绪得分

疫情不仅带来负面情绪,也影响人们的家庭关系和工作。根据追访调查中受访者的评价,我们统计了

疫情中男女两性在伴侣关系、子女关系、父母关系、工作(在业者)、学习(在读者)受到“积极影响为主”“消极影响为主”“没有影响”的比例。由于疫情对家庭关系和工作的影响因人而异——有些人受到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有些人受到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为了展示的简炼性,我们对每个评价方面构造一个指标,即用受积极影响为主的百分比减去受消极影响为主的百分比,作为评估两性在某一方面平均而言所受疫情影响的净方向,如果净方向为正,说明在这一方面受积极影响者多于受消极影响者,反之则是受消极影响者更多。图 3 显示,大多数人评价其家庭关系受疫情的影响以积极为主多于以消极为主,但男性受益更多,体现为:在伴侣关系上,男性受积极影响者更多,女性则受消极影响者更多;在与子女、父母的关系上,男性和女性皆是受积极影响者多于受消极影响者,但男性受积极影响的比率高出女性。与家庭关系的变化不同,疫情对工作乃至学业的影响都是消极为主的评价明显多于积极为主的评价。其中,女性认为工作、学业受到消极影响的比例比男性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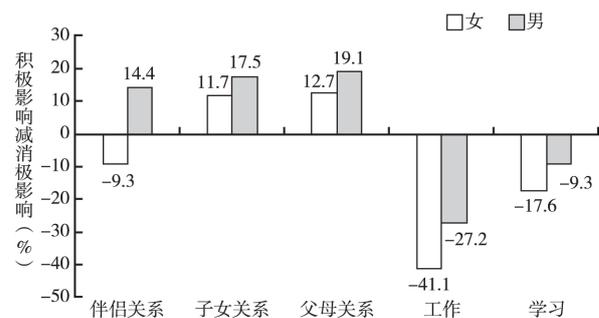


图 3 各领域男女两性受到疫情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比例之差

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作、家庭关系在疫情中的变化对两性负面情绪的变化有何影响?对此,我们用因变量方差削减的方法比较个人特征、工作状态、家庭关系对负面情绪变化的相对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图 4 展示了这三组自变量与因变量回归的双变量判定系数和偏判定系数。根据之前的介绍,双变量判定系数与偏判定系数的差距越大,说明某类自变量对因变量方差的解释比例越高。我们发现,对女性而言,家庭关系的变化对负面情绪变化的解释

比例最高,其次是个人特征,工作状态的解释比例最低,或者说工作状态对女性而言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因素的变化相重叠。对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年龄这些个人特征对其负面情绪的变化解释比例最高,其次是家庭关系,但家庭关系对男性负面情绪的解释比例不如女性高,工作状态的改变对其负面情绪的变化的解释比例也非常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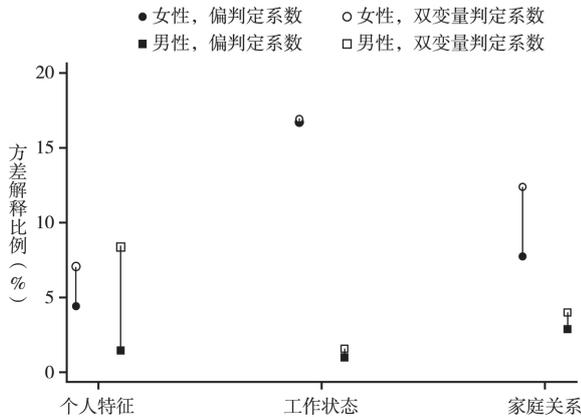


图4 个人特征、工作状态、家庭关系对两性负面情绪变化方差削减比例

接下来,我们分别针对男性和女性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探讨疫情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与其心理情绪改变之间的具体关系。表2和表3分别展示了女性和男性以基线得分、个人特征、工作状态、家庭关系的主效应模型的回归系数和在主效应模型(1)基础上加入工作状态和家庭关系交互项的交互模型的回归系数。表2和表3的主效应模型显示,较之工作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工作发生消极变化会显著增加女性和男性的负面情绪,而工作在疫情中发生积极变化者与工作没有受到疫情影响者在负面情绪的变化上没有显著差异。

图5展示了假定基线调查负面情绪得分为4分、个人条件相同(25-44岁、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所在省份新增确诊数为0、家庭关系没有变化的在业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受到疫情不同影响下负面情绪得分变化的预测值。图5显示,在同等条件下,无论是工作发生积极变化、消极变化还是基本不受疫情影响,男性比女性负面情绪的缓解均更多;但对女性而言,如果其工作在疫情中发生了消极变化,其负面情绪

的缓解程度明显低于工作不受影响或者发生积极变化时的程度,女性所展示的这种梯度性比男性更为突出。

表2 影响女性负面情绪变化的因素的OLS回归系数估计(N=2366)

	主效应(1)	主效应(2)	交互效应
基线得分	-0.663** (0.020)	-0.658** (0.020)	-0.641** (0.02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392** (0.040)	-0.364** (0.039)	-0.362** (0.039)
25-44岁	-0.055 (0.050)	-0.052 (0.050)	-0.083 (0.049)
45岁及以上	-0.028 (0.053)	0.020 (0.052)	-0.014 (0.052)
所在省份新增确诊数	-0.015**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工作以积极变化为主	0.073 (0.084)	0.153 (0.083)	-0.158 (0.157)
工作以消极变化为主	0.635** (0.040)	0.588** (0.040)	0.626** (0.039)
退出劳动力市场	-0.328** (0.055)	-0.306** (0.055)	-0.368** (0.056)
在读	-0.113* (0.053)	-0.152** (0.053)	-0.229** (0.054)
家庭关系平均分	-0.447** (0.032)		-0.505** (0.083)
与伴侣关系得分		-0.431** (0.039)	
与子女关系得分		-0.061 (0.049)	
与父母关系得分		-0.133** (0.035)	
家庭关系 × 工作积极变化			0.364 (0.197)
家庭关系 × 工作消极变化			-0.219* (0.092)
家庭关系 × 退出劳动力市场			0.328 (0.174)
家庭关系 × 在读			0.530** (0.101)
常数项	1.771** (0.091)	1.696** (0.091)	1.693** (0.089)
R <sup>2</sup>	0.507	0.525	0.529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表示p<0.05,\*\*表示p<0.01。数据已加权。作为虚拟变量排除的类别依次包括:高中及以下学历、24岁及以下、工作不受影响。

表3 影响男性负面情绪变化的因素的  
OLS 回归系数估计 (N = 1012)

	主效应(1)	主效应(2)	交互效应
基线得分	-0.658** (0.030)	-0.655** (0.030)	-0.658** (0.03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143 (0.094)	-0.149 (0.094)	-0.156 (0.094)
25-44岁	-0.041 (0.067)	-0.043 (0.068)	-0.033 (0.067)
45岁及以上	0.082 (0.103)	0.085 (0.105)	0.094 (0.104)
所在省份新增确诊数	0.000 (0.004)	0.000 (0.005)	0.000 (0.005)
工作以积极变化为主	0.095 (0.115)	0.088 (0.116)	0.108 (0.146)
工作以消极变化为主	0.146* (0.073)	0.148* (0.073)	0.176* (0.079)
退出劳动力市场	0.095 (0.216)	0.098 (0.217)	0.133 (0.223)
在读	-0.074 (0.080)	-0.087 (0.080)	-0.013 (0.088)
家庭关系平均分	-0.101* (0.045)		0.051 (0.114)
与伴侣关系得分		-0.076 (0.057)	
与子女关系得分		0.009 (0.077)	
与父母关系得分		-0.029 (0.044)	
家庭关系 × 工作积极变化			-0.108 (0.206)
家庭关系 × 工作消极变化			-0.118 (0.142)
家庭关系 × 退出劳动力市场			-0.194 (0.355)
家庭关系 × 在读			-0.222 (0.131)
常数项	1.407** (0.157)	1.393** (0.158)	1.373** (0.160)
R <sup>2</sup>	0.345	0.344	0.348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 \* 表示  $p < 0.05$ , \*\* 表示  $p < 0.01$ 。数据已加权。作为虚拟变量排除的类别依次包括: 高中及以下学历、24岁及以下、工作不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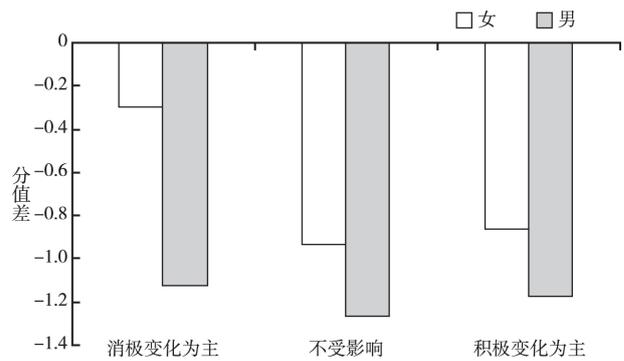


图5 两性工作受到疫情不同影响下  
负面情绪预测值的变化

注: 预测值的估计以表2和表3主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估计为基础, 设基线调查负面情绪为4分、年龄处在25-44岁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所在省份确诊数实现零增长、家庭关系变化得分为0(无变化)。

就家庭关系而言,表2和表3的主效应模型(1)表明,家庭关系的好转能够显著降低两性的负面情绪,而且该效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表2和表3的主效应模型(2)从三个不同维度分别探讨伴侣、子女、父母关系在疫情中的变化对女性和男性负面情绪的净影响。对女性而言,伴侣关系好转对其负面情绪的缓解帮助最大,其次是父母关系,子女关系对负面情绪变化的影响不显著;对男性而言,这三组关系对其负面情绪变化的单独影响均不显著,结合主效应模型(1)的结果,可以理解为单方面改善其中任何一组关系,都未必帮助男性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但若是多组关系产生叠加影响,对男性负面情绪变化会有一定影响。

我们在表2和表3的主效应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各工作状态与家庭关系平均分的交互项。表2的交互模型显示,家庭关系对女性的工作与负面情绪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即显著缓和了女性的工作损失对情绪的不利影响,但家庭关系对男性则无此调节作用(见表3)。图6预测了在工作受到消极影响为主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负面情绪如何随家庭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看到,在工作受到消极影响的男性中,家庭关系变好或是变差,其负面情绪的变化幅度都不大。对于女性而言,如果家庭关系处于恶化状态(如伴侣、子女和父母三项关系中,至少有两项在疫情中发生消极变化),其负面情

绪水平会有所提高,但随着家庭关系趋于好转,女性的负面情绪缓解比较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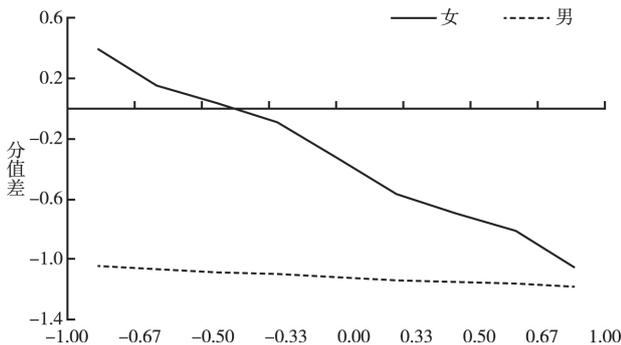


图6 工作恶化时两性家庭关系变化与负面情绪预测值的变化

注:预测值的估计以表2和表3交互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为基础,设基线调查负面情绪为4分、年龄处在25-44岁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所在省份确诊数实现零增长、疫情对工作以消极影响为主。

上述回归分析表明,较之男性,女性的疫情负面情绪变化更多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工作恶化时,家庭关系对女性的情绪调节更为重要,但从图3的比较来看,女性的家庭关系在疫情期间发生积极变化的比例比男性低。虽然我们的调查没有提供更多的数据来解释这一现象,但初步推测,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疫情让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变得更为困难。在前面的介绍中,本文提到疫情期间远程办公手段的使用对女性和男性工作-家庭平衡的意义可能不同。在调查中我们对已复工的在业受访者询问了他们使用远程办公的情况,在图7中分性别描述了那些使用远程办公较多(“完全使用”和“大部分时候”使用远程办公)的受访者对各组家庭关系变化的评价。我们看到,较多使用远程办公手段对男性各组家庭关系的改善都很大,而对女性家庭关系的改善则相对小得多。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了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从上升期到下降期男女两性负面情绪的变化及工作和家庭关系在疫情中的变化对两性负面情绪的影响。通过在疫情期间开展的国内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但较之男性,女性的工作在疫情中受到消极影响的情况更为普遍,这与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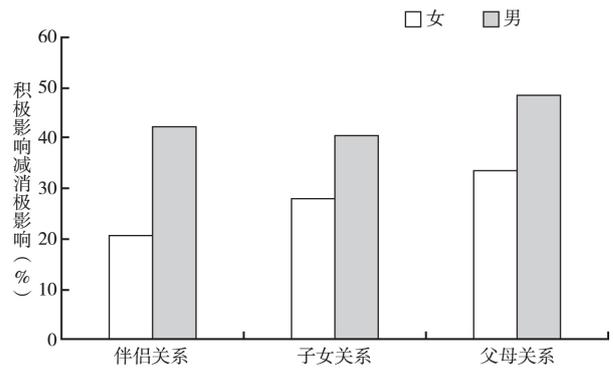


图7 使用远程办公与两性各项家庭关系受到疫情的净影响

注:调查仅对追访时已完全或部分复工者询问了使用远程办公的情况,此处展示的是回答“完全”或“大部分时候”使用远程办公者在各项家庭关系上受到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比例之差。

其他研究的发现一致。在疫情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方面,有人以疫情过后离婚登记处预约爆满为例提出疫情激化了家庭矛盾<sup>[42]</sup>,而本文的调查发现,疫情给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以积极评价为主,但男性在此方面的受益更普遍。在与伴侣的关系上,女性更普遍地认为疫情造成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在与子女、父母的关系上,虽然女性也普遍认为积极影响更大,但仍不及男性突出。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判断,国内疫情对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存在扩大效应。

不过,就面对疫情时的负面情绪及其变化而言,女性虽然在疫情上升期比男性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焦虑、担忧和害怕,但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好转,女性的负面情绪水平已降至与男性无异,也就是说,女性的心理调适和情绪改善并不比男性差。对比以往研究多强调女性较之男性对危机刺激表现出更强烈的即时负面情绪,以及在短期情绪调节策略上也略逊于男性,本研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我们对更长时期内情绪水平和情绪变化上性别差异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负面情绪的变化与人们在工作、家庭领域受到的疫情影响有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工作较多受到疫情消极影响将显著不利于其负面情绪的缓解,但是,较之工作,家庭关系受疫情的影响对负面情绪变化的解释力更高,这尤其体现在女性身上。一方面,家庭关系在疫情当中得到改善,尤其是与伴侣关系得到改善的女性,负面情绪的缓

解更为突出。虽然家庭关系的改善也有助于男性降低负面情绪,但这一效应对男性的影响不如对女性强。另一方面,家庭关系对女性而言还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对于工作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女性,家庭关系的改善会显著降低工作损失对其负面情绪的不利影响,而对男性则无此效应。

上述研究发现凸显了家庭在中国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重要意义。曾有学者指出,中国人素有的家国情怀在应对疫情中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政府明确号召‘居家隔离’,使得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社会单元被凸显,家庭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力量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sup>[43]</sup>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疫情期间在社会经济生活停摆或失序的状态下,家庭提供了危机期间重要的社会支持,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帮助层面,还体现在心理层面,疫情期间家庭关系的改善能够有效帮助人们缓解面对疫情时的焦虑、担忧与害怕,有助于人们的心理调适。

本研究的发现还有助于我们反思疫情防控对于女性的影响,以及如何帮助女性更好地应对疫情。可以看到,家庭关系的改善对缓解女性负面情绪,尤其是对缓解工作因疫情发生消极变化的女性负面情绪效果更为突出。然而,男性却比女性更普遍感受到疫情期间家庭关系的改善。我们推测,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女性一以贯之对家庭的密集投入让她们在疫情期间与父母、子女或伴侣关系的改善空间不如男性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女性在疫情期间亲力亲为承担了更多辅导孩子的功课、照料老人、安抚家人情绪、督促家庭成员养成健康的作息和卫生习惯等家庭劳动和责任,她们因此直面更多的家庭矛盾或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对许多男性而言,居家隔离和在家工作也许意味着亲子相处的契机;但对很多女性而言,居家隔离意味着更多家务,在家工作意味着更难实现工作—家庭平衡,这在我们对远程办公与两性家庭关系的初步分析中也有所体现。迄今为止,国内的防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较高的成本通过降低人口流动来阻断病毒的传播,小区封闭管理、居家办公、关闭室内公共娱乐场所、学校停课等严格的措施实际上将防范疫情的责任和成本分

摊至每个家庭,通过家庭内部的分工,这些成本又具体落在了女性家庭成员身上,导致她们承受更多的工作—家庭冲突或家庭矛盾,不利于其在疫情期间的心理调适。从这个角度反思,若要降低疫情对女性情绪和心境的不利影响,在家庭内部,应该更多提倡男性分担家务和照料责任,减轻女性的负担和压力;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制定防疫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家庭在育儿和养老方面的异质性和困难,针对不同的情况增加一些灵活性,能从家庭友好、人性化的角度权衡“一刀切”做法的利弊,或者提供一些切实帮助家庭渡过难关的服务,这些都将是有助于降低女性面对疫情的负面情绪和疫情期间的性别不平等。

本研究的结论是以我们在疫情期间所做的网络追踪调查为基础的。及时的在线调查让我们掌握了疫情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一手数据,追踪调查的设计则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同一批受访者在疫情不同时期负面情绪的变化。但迅速组织起来的在线调查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比如,网络样本往往对中老年人群、低学历群体和男性的代表性不足,这些偏误不可能完全通过事后加权来消除,毕竟加权虽然平衡了样本在少数主要变量上的分布,却不能弥补群体内部异质性的不足。又比如,为了追求时效性,疫情期间的调查准备比较仓促,考虑到受访者可能会因缺乏耐心或者认为访题敏感而中途退出调查,我们舍弃了很多涉及个人及其家庭经济特征的访题,导致以现有数据难以探讨家庭关系、工作对两性负面情绪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或是对分析结果进行更多的校验。此外,疫情对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是随着其发展逐渐显现的,在疫情之初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故我们没能在基线调查时采集受访者于疫情之前或之初工作和家庭关系的特征,而是在追访调查中让受访者回溯性地评价疫情对其家庭关系、工作、学业等方面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这些评价可能相当主观或者基于事后归因。而且,由于这一组访题只有一次测量,缺乏前后对比的数据,这也极大地限制了本研究可用的方法,例如无法使用因果推断的双重差分法(DID)。因此,对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也希望有机

会能在全国代表性社会调查中加以检验。结合上述对调查的反思和本文的研究发现,我们建议,未来在评价疫情或其他社会危机的后果时,应该重视家庭、

性别的议题及其数据采集,为深入了解性别不平等的发展和机制、探讨家庭关系对健康等后果的影响提供更多经验证据。

#### [参考文献]

- [1]杨铭、向德平. 重大疫情中负面社会情绪的治理[J]. 社会工作 2020 (1) .
- [2]Gordijn E. H. ,Yzerbyt. V. ,Wigboldus. D. ,et al.. Emotional Reactions to Harmful Intergroup Behavior[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6 36(1) .
- [3]Mackie ,D. M. ,Devos T. ,and Smith ,E. R.. Intergroup Emotions: 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9(4) .
- [4]Van Z. M. ,Spears. R. ,Fischer ,A. H. ,et al..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7(5) .
- [5]Yzerbyt V. ,Dumont. M. ,Wigboldus ,D. ,et al..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42(4) .
- [6]Lee S. A. ,Jobe ,M. C. ,Mathis ,A. A.. Mental Health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Dysfunctional Coronavirus Anxiety [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20 (4) .
- [7]郭菲、蔡悦、王雅蕊等.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众的情绪健康和社会心态现状[J]. 科技导报 2020 38(4) .
- [8]孙元明. 灾难中社会恐慌的生成、演绎、变化及其危害性——重大疫情防控期社会情绪应急管理及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情绪治理[J]. 前沿 2020 (4) .
- [9]易晓明、席居哲、薛璟.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学生的情绪、学习/研究状态的影响[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6) .
- [10]Qian ,Y. and Fan ,W.. Who Loses Income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Evidence from China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20 68(8) .
- [11]Scheidel ,W..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2]Witteveen ,D.. Sociodemographic Inequality in Exposure to COVID-19-Induced Economic Hardship in the United Kingdom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20 69(10) .
- [13]Witteveen ,D. and Velthorst ,E.. Economic Hardship and Mental Health Complaints During COVID-19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117(44) .
- [14]Hu ,Y.. Intersecting Ethnic and Native-Migrant Inequalities i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UK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20 68(8) .
- [15]Wenham ,C. ,Smith J. and Morgan ,R.. COVID-19: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the Outbreak [J]. *The Lancet* 2020 395(10227) .
- [16]Pérez-López ,F. R. ,Tajada ,M. ,Cornudella ,R. S. ,et a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nd Gender-Related Mortality in European Countries: A Meta-Analysis [J]. *Maturitas* 2020 ,141.
- [17]World Bank Group. Gender Dimensio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R]. Openknowledge: Worldbank 2020.
- [18]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lobal Wage Report 2020-21: Wages and Minimum Wage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R]. Geneva: ILO , 2020.
- [19]Muric ,G. ,Lerman K. ,Ferrara E.. COVID-19 Amplifies Gender Disparities in Research [J/OL]. <http://arxiv.org/abs/2006.06142> 2020.
- [20]Kristal ,T. ,Yaish ,M.. Doe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Level Gender Inequality Curve? ( It Doesn't )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20 68(8) .
- [21]Collins ,C. ,Landivar L. C. ,Ruppanner ,L. ,Scarborough ,W. J.. COVID-19 and the Gender Gap in Work Hours [J].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20 (8) .
- [22]Shockley ,K. M. ,Clark ,M. A. ,Dodd ,H. ,King ,E. B.. Work-Family Strategies During COVID-19: Examining Gender Dynamics among

- Dual-Earner Couples with Young Childre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0 ,106( 1) .
- [23]Roesch E. ,Amin A. ,Gupta J. ,et 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Restrictions [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online) 2020 369.
- [24]González-Sanguino C. ,Ausín B. ,Castellanos M. et al..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 ( COVID-19) in Spain [J].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2020 87.
- [25]Liu N. ,Zhang F. ,Wei C. ,et al..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PTSS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Hardest-Hit Areas: Gender Differences Matter [J]. *Psychiatry Research* 2020 287( 5) .
- [26]Moghanibashi-Mansourieh A.. Assessing the Anxiety Level of Iranian 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J].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20 51( 1) .
- [27]Rodríguez-Rey R. ,Garrido-Hernansaiz H. and Collado S..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Associated Factor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ronavirus ( COVID-19) Pandemic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Spai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 11) .
- [28]Wang C. ,Pan R. ,Wan X. ,et al.. Immediate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2019 Coronavirus Disease ( COVID-19) Epidemic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 ,17( 5) .
- [29]余萌、黄悦宜、陈润婷等. 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同群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 [J]. *四川精神卫生* 2020 33( 3) .
- [30]靳霄、邓光辉、经曼等. 情绪主观体验的性别差异 [J].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9 30( 19) .
- [31]Grossman M. and Wood W.. Sex Differences in Intensity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A Social Role Interpreta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5( 5) .
- [32]张慧、罗玲玲. 大学生对核能发电安全风险的感知和性别差异——以辽宁省两所高校 300 名在校大学生为例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5 37( 4) .
- [33]宋爽、李帅、王学森等. 大学生应对突发性危机的情绪调节策略探究 [J]. *心理月刊* 2020 ,15( 22) .
- [34]何相材、郭英、何翔等. 中国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的元分析 [J]. *上海教育科研* 2019 ( 8) .
- [35]李飞、卢盛华. 情绪体验的性别差异及其成因 [J]. *社会心理科学* 2014 ( 2) .
- [36]Condry J. ,Condry S.. Sex Differences: A Study of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J]. *Child Development* ,1976 47( 3) .
- [37][美]G. H. 埃尔德著 ,田禾、马春华译. *大萧条的孩子们*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38]Minor O. M.. Ebola and Accusation ,Gender and Stigma in Sierra Leone's Ebola Response [J]. *Anthropology in Action* 2017 24 ( 2) .
- [39]Hjálmsdóttir A. and Bjarnadóttir V. S.. I Have Turned into a Foreman here at Home: Families and Work-Life Balance in Times of COVID-19 in a Gender Equality Paradise [J].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020 ( 9) .
- [40]Lyu M. ,Li W. and Xie Y..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Structural Factors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s: A Cross-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5( 2) .
- [41]Xie Y. and Zhou X..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 19) .
- [42]刘芳. 疫情背后的离婚真相 [N]. *中国青年报* 2020-05-08.
- [43]周飞舟. 从疫情看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文化思考 [N]. *光明日报* 2020-06-19.

责任编辑: 怀明